

· 学术综述 ·

近 50 余年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述评^{*}

彭 南 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

[关键词] 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

[摘 要] 建国以来的 50 余年,中国经济史学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还很多,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仍存在着分歧。今后的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必须秉持客观与理性的精神,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加强量化分析,使中国近代经济史、近代乡村史的研究更加趋于精细和完整。

[中图分类号] K25;F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5)11-0106-10

A Review of Modern Chinese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History in Recent 50 Years

PEN G Nan-sheng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Hubei, China)

Key Words: modern China; the rural handicraft industry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search state of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economy history in modern rural China since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ums up the main views of the academia, and analyzes the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The author thinks the handicraft industry economy history research in modern rural China must adhere to objective and rational spirits in the future, and combines the whole research with regional, trade study together, strengthen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t the same time, thus making the modern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modern Chinese rural history more detailed and complete.

本文拟对 1949 年以来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基本状况、主要观点及其分歧和现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研究如何进一步深入提出看法,以就教于学界同仁。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在所引用的论文中,虽然有些并未直接以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为题,但从行文及所引材料看,乡村手工业亦是这些论文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 研究状况综述

建国以来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大致上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各个阶段所关注的问题及其所研究的取向不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1949 年至 1966 年,学术界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虽然论文不多,但质量很高。关注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中国传统手工业与近代工业的关系、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研究工作表现了更多政治取向,尤其是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谴责和批判。1966 年至 1976 年,文革十年,学术成为政治的附庸,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虽然幸免于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由于学术界移情于革命史、阶级斗争史,这一领域的研究事实上无法展开,倒是国外汉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走在

了我们的前面。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以来,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逐渐细化与深化,领域逐步拓宽,新观点不断出现,既有跨区域、跨行业的宏观性的总体观察,也有分区域、分行业的具体入微的探析,强烈的学术关怀与现实关怀成为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取向,讨论更加趋于理性与客观。

迄今为止,虽然尚无一部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专著,但相关著作中的探讨并不少见,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科学出版社 1955 年版)是国内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棉纺织业的专门性著作,其中相当篇幅分析了近代以来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及其生产关系的蜕变,为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三卷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再版本)分析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生、发展过程。全慰天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中,全面评述了手

^{*} 本文系教育部 2000 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近代乡村前工业化问题研究”(教研办[2000]22 号)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5 年度重大项目“民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农村手工业经济研究”(05JJD77001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工业的发展概况及其与民族机器工业的关系。段本洛、张圻福著《苏州手工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虽然主要以苏州城镇手工业为讨论对象,但乡村手工业亦有涉及。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在分析机器缫丝工业的同时,也附带论及手工缫丝业。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对手工业的兴衰状况及其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汪敬虞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 1895~1927》(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在第十三章中纳入了由王翔撰写的手工业,对这一时段的手工业经济进行了总体评析,并对十个行业作了示例性研究。苑书义、董丛林著《近代中国小农经济的变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将乡村工副业纳入小农经济体系中,分析了农民家庭工副业中的主要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织业、草帽辫、花边、发网业及其他家庭副业的兴衰概况。中青年学者王翔、彭南生分别出版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经济学考察》(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和《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从宏观上论述了手工业在近代中国兴衰演变的原因、地位及其作用。但是上述著作未将近代乡村手工业从城市手工业中分离出来,看不出手工业在近代农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者将手工业作为机器工业的一个配角,看不出乡村手工业自身的变迁。

与此同时,区域性的近代农村社会经济史专著或专门性的行业史著作也非常关注区域内的手工业经济状况。乡村手工业是行业史研究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否则,区域社会经济史或行业史的整体性将受到影响,因此相关著作都或多或少地迁涉到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朱新予主编的《浙江丝绸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徐新吾主编的《近代江南丝织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等,主要分析了近代江南城乡丝织业的演变。徐新吾主编的《江南土布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分上、下编,上编缕述了近代上海地区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商业的变化,下编辑录了江苏江阴、常熟、常州、无锡、苏州、南通以及浙江慈溪、平湖、硖石等地的土布史料,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便利。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四部分以“手工业与乡村经济”为题,对近代河北、山东、河南的主要乡村手工业进行了分析。曹幸穗著《旧中国苏南农村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版),充分利用满铁的“中国农村实态调查”资料,讨论了农村工副业生产及其在农家经济中的地位、农副产品及其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苑书义、任恒俊、董丛林等著《艰难的转轨历程——近代华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以“传统手工业的变迁”为题,粗线条地概述了华北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庄维民著《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中华书局 2000 版)从山东工业化进程的角度分析了

传统手工业结构的嬗变、农产品加工业的工业化进程。林刚在《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重点探讨了家庭棉纺织业、蚕桑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之间的关系。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 2001 年版)描述了传统手工业到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张利民等人合著的《近代环渤海地区经济与社会研究》(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年版)将手工业纳入该区域工业体系中,分别讨论了辽宁、天津、山东工业体系的特色,肯定了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及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侯建新著《农民、市场与社会变迁——冀中 11 村透视并与英国乡村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利用解放前国内外有关农村调查资料,从农村产业结构变化的视角,对冀中 11 村工副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的探讨。徐浩的《农民经济的历史变迁——中英乡村社会区域发展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利用方志资料,以织布业为例,简略地分析了华北农村工副业的扩张。马俊亚在《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中,以专章对江南农村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新近唐致卿推出了《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7 月版),篇幅达 72 万字,其中第四章第三节以 2.5 万字的篇幅简要地探讨了“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的存在领域。不过上述研究除个别较为深入外,大多将乡村手工业视作行业史或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绕不过去的“坎”,讨论停留在浅层次上,有些只是点到为止。不仅如此,这类研究普遍存在着行业的不平衡性与地域的不平衡性,就行业而言,棉纺织业、丝织业等是讨论中的重点,其他众多行业较少,有些则根本尚无触及,就地域而言,除华北、江南考察较为充分外,其他广大地区探讨较为薄弱。

相比之下,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学术质量,亦无论是研究的深度,还是讨论的广度,论文都大大超过了专著,对推动近代中国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发展,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虽然有些论文并非专门以乡村手工业经济为题,但大量利用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料,其结论无疑也是适用于乡村手工业的。

1956 年,陈诗启探讨了近代中国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 1956 年第 4 期),稍后他又撰文分析了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历史研究 1959 年第 2 期)。彭雨新以丝棉手工业为例,剖析了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对我国原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光明日报 1961 年 8 月 2 日)。1962 年,樊百川撰文揭示了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历史研究 1962 年第 3 期),1965 年戴逸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人民日报 1965 年 8 月 20 日),希望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推向深入。然而,随后的“文革”使这一讨论进程中断了十余年之久。这一时期,讨论

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专文虽然不多,但质量较高,视点集中,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与重点。

改革开放后的最初几年中,学术界对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仍然乏力,学术论文仅见李炳东对广西近代手工业兴衰演变的宏观概述(广西大学学报 1979 年第 3 期),夏林根以地方志史料为依据,对上海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所做的分析(中国地方志通讯 1983 年第 1 期)。鉴于这种状况,彭泽益呼吁重视中国近代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忽略近代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使得中国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形象不够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因此专门撰文“希望能够引起重视,充实这方面的调查研究”(近代史研究 1984 年第 1 期)。此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论文渐渐多了起来,唐文起探讨了营口土布市场的兴衰对南通土布业的影响(江海学刊 1985 年第 5 期)。潘景隆、谭禹对光宣年间吉林蚕业的兴衰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讨论(历史档案 1985 年第 1 期)。李达三从微观角度剖析了近代河北高阳土布的盛衰情形(河北大学学报 1985 年增刊)。1986 年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进入兴盛时期,无论是宏观探讨还是区域研究,亦无论是手工业经济整体还是若干重要手工业行业,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对象,出现了一系列的新观点。

就宏观研究而言,李荣昌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近代工业与传统手工业之间的竞争(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87 年第 3 期)。张学君对 19 世纪后期的四川工场手工业进行了实证研究(社会科学研究 1987 年第 3 期)。陈玉环、刘志伟利用《沙湾楚旺房陈氏家谱》,从个案角度讨论了清代后期广东的丝织工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 年第 3 期)。乡村手工业的兴衰变化与近代社会运动密不可分,张思从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破产的角度考察了北方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原因(《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版)。汪敬虞就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提出了新的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徐新吾从总体上考察了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发展过程的不平衡性(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年第 1 期)。王方中以大量丰富的史料探讨了 1930~1937 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及其原因(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 年第 5 期)。谢放以四川为例,讨论了近代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近代史研究 1990 年第 1 期)。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批中青年学者将研究视野聚焦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这既是手工业经济史受到重视,研究工作进一步细化的表现,也是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受到关注,进而带动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种反映。曹幸穗站在农民家庭经济的微观角度分析了近代苏南地区农村手工业副业的存在状况及其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 年第 3 期)。陈庆德论述了中国近代乡村

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990 年第 3 期)及其发展趋势与归宿(求索 1991 年第 6 期)。史建云以华北地区抗战之前的情况为依据,从市场角度分析近代农村手工业对近代民族工业的促进作用(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6 年第 1 期),对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现象及其原因提出了新看法(近代史研究 1996 年第 3 期),并论述了华北手工业生产力的变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8 年第 4 期)。王翔探讨了近代中国行会手工业的演变(历史研究 1998 年第 4 期)及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危机(江海学刊 1998 年第 3 期)、手工业经济结构等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年第 2 期)。彭南生发表了系列论文,其中《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二元模式》(史学月刊 2001 年第 1 期)、《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华中师大学报 2002 年第 2 期)、《包买主制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史学月刊 2002 年第 9 期)、《半工业化:近代乡村手工业发展进程的一种描述》(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7 期)、《论近代乡村半工业化的兴衰》(华中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5 期)、《“地方能人”与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发展》(江苏社会科学 2003 年第 4 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研究,提出了“半工业化”分析框架,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并分析了发展的多种因素。此外,他还撰文评价了晚清、民国政府的手工业经济政策与措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华中师大学报 1998 年第 6 期、2000 年第 1 期),以及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年第 2 期)。万振凡、孙桂珍重新评价了近代中国农民家庭手工业(江西师大学报 2003 年第 1 期)。

陈西平从区域研究的角度,以清末湖南为横截面,透视资本主义手工业的发展,并探讨了它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90 年第 10 期)。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4 年第 2 期),他后来将这一研究扩大到近代长江沿江城市周边农村的非农产业,明确肯定乡村手工业的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9 年第 3 期)。刘华明按时段顺序对 1840~1949 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描述(史学月刊 1994 年第 3 期)。胡水凤对近代江西几种主要手工业的兴衰变化进行了考察(江西社会科学 1993 年第 6 期)。史若民则探讨了近代山西部分手工业的变迁(山西师大学报 1991 年第 1 期)。戴鞍钢研究了开埠后的近代上海与周围乡村手工业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近代城乡经济关系的内涵(史学月刊 1994 年第 2 期)。李先富探析了清末民国时期广西手工业的发展及其在市镇发展中的地位(广西师大学报 1996 年第 1 期),宾长初揭示了广西近代手工业的变化(社会科学家 1996 年第 3 期)。乡村手工棉纺织业在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等红色区域中十分重要,刘宏探索了晋察冀边区的棉纺织业(河北学刊 1998 年第 1 期)。刘萍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妇女纺织运动进行了考察(抗日战争研究 1998 年第 2 期)。张静以草辫、

花边、发网业为例,探讨了近代山东农村手工业的外向型发展(史学月刊 2002 年第 2 期)。李靖莉评述了黄河三角洲地区近代手工业的商品化倾向(东岳论丛 2003 年第 2 期)。杨华论述了清末民初黑龙江手工业的发展情况(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4 期)。更多区域性的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是从行业史反映出来的。

就手工业行业史而言,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等多有专文探讨,其中棉纺织业是讨论重点,研究的视角既有整体性的行业史,也有区域性的行业史。夏布是近代乡村重要的纺织业,胡水凤探讨了近代江西夏布的产销问题(江西大学学报 1986 年第 3 期)。林顿等简要考察了清末四川的手工棉织业状况(社会科学研究 1986 年第 2 期)。刘灿河通过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山东手工棉纺织业的考察,提出了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新认识(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经济史》1988 年第 6 期)。陈惠雄提出了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多元分解的历史解说(历史研究 1990 年第 2 期)。李金铮对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定县的家庭棉纺织业进行了实证研究(河北学刊 1991 年第 3 期)。陈美健具体分析了清末直隶工艺总局在高阳织布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河北大学学报 1992 年第 2 期)。刘华明对近代百年间上海地区农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的变迁状况及其原因进行了描述性的讨论(史学月刊 1994 年第 3 期)。张思对清末直鲁地区农村手工纺织业的曲折经历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明清史研究室:《清王朝的建立、阶层及其他》,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他后来将视野扩大,以直鲁地区农村手工业为例,考察了 19 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史学月刊 2003 年第 11 期)。阚维民对民国初年山东手工棉纺织业中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具体入微的探讨(民国档案 1996 年第 2 期)。林刚就 1927~1937 年间的中国近代手工棉纺织业提出了新观点(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在蚕丝业研究中,严学熙论述了蚕桑生产与无锡近代农村经济的关系,肯定了蚕桑业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近代史研究 1986 年第 4 期)。姚玉明深入挖掘了近代浙江丝织业生产的演变及其特点(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7 年第 4 期)。王翔从近代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传统丝织业的发展过程(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9 年第 3 期)。李平生着重就 1929~1933 年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对中国蚕丝业的生产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详细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9 年第 4 期)。徐秀丽对近代浙江湖州地区蚕丝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考察(近代史研究 1989 年第 2 期)。张晓辉探讨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暨南学报 1989 年第 3 期)。黄慰愿从生产力角度分析了广东近代蚕丝业畸形发展的原因(中国农史 1989 年第 4 期)。徐新吾、张守愚综述了江南丝绸业的历史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1 年第 4 期)。王翔的研究更为深入,他对近代江南丝绸业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迁进行了分析(近代史研究 1992 年第 4 期),又考察了对外贸易

的发展对中国丝绸业近代化的促进作用(安徽师大学报 1992 年第 1 期)。彭通湖对抗战前四川纺织业的兴衰状况进行了初步探讨(档案史料与研究 1992 年第 4 期)。李平生对晚清蚕丝业改良进行了重新考察,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所存在的局限性(文史哲 1994 年第 3 期)。周从平探索了浙江近代的蚕丝改良(浙江学刊 1997 年第 3 期)。汪敬虞从中国近代生丝贸易的变迁入手,评述了缫丝业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1 年第 2 期)。

在制茶业研究中,苏鑫对近代安溪制茶业进行了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6 年第 4 期)。汪敬虞从对外贸易的视角研究了中国近代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 1987 年第 6 期)。戴鞍钢对近代中国植茶业的盛衰进行了全面考察(史学月刊 1989 年第 1 期)。张笃勤对近代汉口与俄国间的茶叶贸易进行了探讨(江汉论坛 1994 年第 2 期)。杜七红论述了茶业对晚清汉口市场的影响(江汉论坛 1999 年第 6 期)。胡赤军全面考察了近代中国与西方的茶叶贸易(东北师大学报 1994 年第 1 期)。陶德臣发表了系列论文,深化了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史研究、揭示了其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农史 1996 年第 2 期)、出口茶业的经济结构(苏州大学学报 1997 年第 4 期)、以及伪劣茶对近代中国制茶业的负面影响(中国农史 1997 年第 3 期),他还从中外对比角度对 19 世纪 3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中印制茶业进行了比较研究(中国农史 1999 年第 1 期),对近代中国茶叶生产中的高利贷金融资本(中国农史 2001 年第 3 期)、茶农经营状况等(中国农史 2003 年第 1 期)进行了分析。唐文起则细致分析了我国近代茶叶交易中的初级市场(江海学刊 1994 年第 5 期),刘森探讨了民国时期祁门红茶的产销统制问题,涉及到这一时期乡村制茶业中的政府行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99 年第 4 期)。周翔鹤探讨了晚清台湾乡村制茶业(台湾研究集刊 2001 年第 2 期),皮学军讨论了民国时期湖南安化制茶业走向衰落的具体原因(益阳师专学报 2002 年第 5 期)。贺④则通过对 1886~1896 年间中国红茶出口的考察,探讨了中国近代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福建论坛 2003 年第 1 期)。林齐模以华茶对英出口为中心,具体考证了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的衰减(历史研究 2003 年第 6 期)。

其他乡村手工业行业也略有探讨,如林仁川对民国时期福建纸的生产与运销进行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 年第 1 期),胡水凤简要考述了近代江西的苧麻业(中国农史 1989 年第 4 期)。魏娅娅从出口贸易入手,分析了近代中国榨油业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1989 年第 6 期)。李志英分析了近代中国传统酿酒业的发展,填补了该行业史研究的空白(近代史研究 1991 年第 3 期)。郭大松、庄慧娟肯定了传教士在近代山东花边、发网业兴起中的历史作用(烟台大学学报 1994 年第 3 期)。梁勇对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问题进行了讨论(重庆三峡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1 期)。

有关农村集市、贸易等方面的论文对近代乡村手工业也多有涉及,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介绍。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界成为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赵冈研究了鸦片战争后进口棉货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他与陈钟毅合著的《中国棉业史》(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印行)对中国近代手工纺织业的生产制度、技术条件以及其他有关因素进行了探讨,此外,他在《现代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5年版)、Albert Feuerwerker(费维恺)在《1870~1949年的中国经济》(密执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1968年出版)《1871~1910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经济史杂志第30卷第2期,1970年6月)等文中,深入分析了机器纺织业与手工纺织业的关系。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若孟关于中国近代农民经济的研究中,对农村手工业多有涉及,他还发表了一些专题性的论文,如《手工棉纺织业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经济史评论1965年第3期),从中、日比较的角度分析了手工棉纺织业在两国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联合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容国石探讨了中国手工纺纱的衰落与演变(美国《清史问题》1974年第2期)。此外,美国学者李明珠的《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中译本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出版),作者将乡村蚕丝业置于近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大背景下,探讨了江南及其他地区蚕丝业的发展及其在农民家庭经济中的作用。黄宗智探讨了华北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工业,他的学生、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叶汉明分析了山东潍县近百年农村社会经济的演变,潍县乡村手工业是其探讨的重点之一。日本学者森时彦新近推出了《中国近代棉业史之研究》(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1年)“着眼于中国传统棉纺织业与来自西欧的近代棉纺织工业相碰撞而发生变化的过程”。

从总体上看,近五十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研究,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无论是整体性的概论,行业性的专论,还是区域性的分论,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以后该领域的深入研究积累了良好条件。但是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薄弱环节仍然很多,需要我们在总结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视已经形成共识的观点,正视研究中尚存在的分歧,整合力量,在新的起点上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的研究推向深入。

二 现有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分歧

综观现有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问题及其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关于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关系,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传统手工业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之间有着内在的、前后相承的关系,这等于说中国既有的手工业存在着向资本主义现代工业发展的历史趋向。早在上世纪60年代,戴逸在《中国近代工业和旧

式手工业的关系》一文中就提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社会经济和手工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是中国近代机器工业由以产生的出发点和内在根据。离开了这个出发点和内在根据,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就会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1]吴承明在20世纪80年代进一步呼应了这个观点,他从劳动力、资本市场等方面阐明手工业为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条件,指出:“在中国,也有些同志认为,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断了。鸦片战争后近代工业的建立是另起炉灶,与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无继承和发展关系。这可称为‘中斷论’。”^{[2](p128)}那种认为我国资本主义是鸦片战争后从外国移植来的,“更站不住脚,这种理论是否定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只把使用机器和机械动力的近代工业算作是资本主义。”^{[3](p758)}但是樊百川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洋务运动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不但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来,而且恰恰是随着手工业的破产,在这种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的情形下,由于外国机器工业的刺激,一部分从封建势力控制下的官办军事工业逐步演变而来,一部分在托庇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之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4]80年代后期,汪敬虞针对这一观点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原有的手工业并没有中断,绝大部分在鸦片战争后继续存在,但并不是向手工工场发展,也没有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中国原有的手工业以至整个经济,还远没有为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产生,准备必要的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条件下产生的’,大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依赖、荣损与共的关系,但是,‘中国大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的‘长期共存’,并不是由于工厂和手工业在机械化程度方面彼此互相接近,而是由于中国工厂和手工业同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势力面前,有着共同的命运。这种‘长期共存’,不是发展中的共存,而是两者都得不到发展的并存。”^[5]

笔者认为,在传统手工业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关系问题上产生上述分歧,既有概念上的混乱,也有理论与史实上的脱节。从概念出发,机器工业不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手工业中也存在着“资本主义”,这里的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生产关系,严格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雇佣关系,既然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内部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鸦片战争后也没有中断,那么就没有理由将近代资本主义限制在民族机器工业这种生产力层次上。这样,在分析传统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产生的关系时,就不必上升到它与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之间的关系了。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有可能产生机器工业,但在事实上,中国近代民族机器工业的出现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由晚清政府通过引进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与原有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没有什么关系,这并非什么不可理解的事情。

不过,民族机器工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存是事实,两者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充分肯定民族机器工业与近代手工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肯定手工业从附属于传统农业经济到附属于大机器工业的进步作用。吴承明认为:“大体在1920年以前,手工业与近代化工业界并行发展的,现代工业发展较快的时候也是手工业尤其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是这样,两者间的互补作用超过两者间的对抗。”^[6]樊百川认为近代手工业与大机器工业之间是一种依附关系,认为:“一方面,大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通过加工订货、收购和赊销,统率着广大的小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所有各种手工业,从工场手工业到农民家庭手工业,又都依附于大机器工业,甚至成为大机器工业的厂外附属部分。中国手工业,从这时开始,再也不是孤立于资本主义之外而独立发展了,它已经逐步纳入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范围和轨道。”^[4]彭泽益也指出,鸦片战争后的手工业,“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经济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黄逸平也肯定了这种补充意义,“这种补充,不仅在于大量手工业产品满足了市场的需要,弥补了大工业产品的不足,也在于它是大工厂产品某些工序的在外协作者。”^[8](p245)史建云着重从农村市场的视角分析了乡村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认为农村手工业使用近代工业生产的原料或工具,农村手工业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同时大多数农村手工业不存在与机器工业的竞争关系,因此,“在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商品生产,在市场问题上,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与之竞争、对抗的一面,促进作用是主要的,而竞争、对抗则是次要的。”^[9]戴鞍钢还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对两者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考察,他充分挖掘地方志中所蕴藏的大量经济史资料,分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特色,认为:“在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生发展有其历史的独特性,它并不意味着以往很多人所认为的个体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没落和破产’,而是通过后者生产结构的内部改组,逐渐与近代工业形成一个互补互动的经济关系。”^[10]彭南生更具体地揭示了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之间多层次的互补关系,包括结构性互补、市场关联性互补、市场水平性互补以及劳动技术性互补。^[11]林刚以大生纱厂与南通农村家庭纺织业的实例,指出“中国近代棉纺织工业的产生……是在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中建立起大工业的产品市场,农民家庭手工业也同时得到改进与更新。”^[12](p54)。马俊亚通过对江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尽管在许多方面,手工业对现代工业有抵触的一面,现代工业对手工业有挤压的一面,但不管怎样,现代工业的发展不是完全悖离中国手工业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利用了这种得天独厚的资源。”^[13](p197)但是,另一种观点不同意将两者间的互动作用估计得过高,相反,认为两者之间是一种

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关系,或提出民族机器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农民家庭手工业被破坏的基础上的,或主张农民家庭手工业的存在构成了机器工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国外有学者认为,手织业使用了改良的手织机,增强了同近代工业的竞争能力,反而阻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14](p179~186)。马若孟也认为清末手工棉纺织业的调整挡住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15](p295~308)。黄宗智也持大体相同的观点,农民家庭手工业不过是家庭式农场的经济支柱,“这种商品化了的手工业,与其说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成为过渡到资本主义工业的跳板,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因为“旧式家庭农场吸收了商品性的手工业生产,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加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商人耗去了一部分可能投入工业的资本,也占去了一大部分可以支撑近代工业的市场”。^[16](p203)

第二,关于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学术界普遍认为,鸦片战争前中国手工业经济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战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对手工业经济造成了复杂的影响,在洋货的打击下,农村手工业一败涂地,此为“压迫论”或“破坏论”。陈诗启针对此前学者一般侧重于外国资本主义机制棉纺织品对中国手工业棉纺织业的破坏面,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棉纺织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广大地区的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自给生产的特点在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促进了农村手工棉纺织业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成长”,尤其是“资本主义家庭工业”在农村中成长起来了,这甚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里程碑”。^[17]樊百川则站在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长时段对鸦片战争后中国手工业的遭遇和命运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认为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原有手工业中已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萌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势力面前,中国固有的手工业大量破产,“手工业的破产,摧毁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所赖以生长的基础,从而也剥夺了中国在正常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可能”。所谓“正常道路”,当然是指从手工作坊到手工工场再到大机器工业这样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另一部分手工业在外国资本和买办商人资本的控制下,变成出口原料的加工手工业从而依附外国资本主义的命运”,这类依附型的手工业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工场手工业和近代家庭劳动,一小部分过渡到机器工业,“这在中国手工业的发展史上,无疑地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4]徐新吾认为,传统“破坏论”是可以成立的,他以手工棉织业为例指出:“帝国主义的机制布是破坏农民手织业的更较重要的力量。”^[18]也有学者认为,简单地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的影响两分为“破坏”或“发展”均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从充当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不自觉的工具,变为阻碍中国工业向资本主义工业转化的势力”,“外国资本家利用中国的特殊国情,阻碍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19]戴逸认为:“外国的侵略可以改变中国经

济发展进程的方向和速度,但是不可能一刀斩断这个进程。^[11]新近张思撰文指出,“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纺织业既经历了一段衰落破产的悲惨遭遇,又迎来重获新生的复兴机遇”,强调“应辩证地看到与遭遇同在的机遇及其历史意义,还应对传统农村经济在机遇面前的对应和表现给予关注”。^[20]国外学者则普遍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影响局限在通商口岸附近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内地农村的传统手工业影响甚微,使其一直得以维持下来。美国学者费维恺认为:“整个手工业在1870~1911年间并没有受到严重破坏”,并称以往中国学者的观点是“最粗浅的公式化的指责”。^[21](p338~378)]过分夸大了外国资本主义的负面影响。赵冈也以手工棉织业为例,论证了传统的“破坏论”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手工织布业迅速发展的有案可查的阶段是发生在现代棉织品进口与国内生产都有重大增长的期间”,^[22](p174)]这即是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传统手工业即便没有促进作用,至少也没有太大的破坏性。

第三,近代乡村手工业与农家“耕织结合”模式的分解。棉纺织手工业不仅是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手工行业,而且也是作为农业与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象征的“耕织结合”模式的典型,因此,棉纺织手工业成为学术界讨论最多、争论最为激烈的一个问题,也是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亮点。传统的主流观点认为,由于洋纱洋布大量倾销,近代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总趋势是逐渐衰落,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不断走向解体。近年来,学者们对传统观点提出了不同认识。徐新吾首先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错觉,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入侵是由通商口岸的沿海地区开始,然后逐步深入内地的,然而“事实是洋纱的入侵先从非植棉地区(主要是闽广)开始”的。又如过去一般认为,洋纱的侵入土布是在全国范围内由土经土纬过渡到洋经土纬,再过渡到洋经洋纬,徐新吾认为,“如果笼统地从总的发展进程来看,也不妨可以这样说,而具体考察则并非完全如此”,各地在发展中存在着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性是需要加以注意的”。^[23]陈惠雄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论中的单线史观进行了挑战,“提出了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乃是朝向经济近代化、商品化进步的历史解说”,他在概述大量史实的基础上,“认为中国传统丝织业在资本主义外力冲击下只呈单线性萎缩,并没有多元发展进步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24]同样对这种单线史观提出挑战的还有谢放,他在《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一文中认为:“洋纱倾销的主要作用不过是改变了‘耕织结合’的形式,即由原来的自纺自织改为买纱自织。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仍然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带来了不利于其进一步分离的消极影响”,在与外国资本的不等价交换中,“‘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亦由此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时而分离,时而结合”,因此不能对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的程度估计过高^[25]。李金铮通过对20世纪20、30年代定县的家庭手

工棉纺织业的实证分析,认为农村耕织结合的解体,“并非来自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动力作用,而是来自外来侵略势力的影响,是一种历史的畸形。”但是,也有学者不同意上述观点,认为20世纪20、30年代,农村自然经济结构并未真正分解,如刘灿河在分析近代中国自然经济解体时,以20世纪20、30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包括当时颇有名气的潍县织布业为例,指出“这些当然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丝毫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气味”,“不可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进而得出结论认为,乡村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正是反映了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坚固性特点。说它‘解体’了,那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它非但没有解体,而且还有所强化”。^[26]

第四,关于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前途。鸦片战争后,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双重冲击下,近代手工业兴衰起伏、历经曲折,但毕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下来了,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手工业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如何看待和理性分析这一历史现象?陈庆德认为,近代手工业发展的内在基础是农民经济的贫困化,“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这一特殊发展过程,完全是在社会经济贫困化的强大推动下形成的”,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后,“无论是传统手工业,还是新兴手工业,都未曾改造旧有的基础。因此,无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与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多么相似,但它同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本身仍有本质的区别”,“与其说中国近代工场手工业是一种资本组织的生产单位,不如说它更靠近前资本主义的小商品生产基础。整个手工业总体发展趋势中这种个体性质的保持,使其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转变,尚有相当大的差距”,“它总是不能向前更进一步转化为机器生产”,并断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已完全建立起来的近代的世界性历史联系中,以手工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其说是向着近代化转变的自然累积过程,不如说是近代化历史转变的道路受到阻塞”。^[27]但是大多数学者仍肯定近代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即使是个体手工业,其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讲,在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它为封建主义服务,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改组,这种个体性质也被改造,使它在不同程度上为资本主义服务,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和必要的补充形式”。^[7]张忠民分析了近代上海农村传统农家手工业,认为近代农村地方工业显示了中国农村摆脱贫困,摆脱传统小生产,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方向。作者在该文中力图穿透历史时段的限制,找寻历史的启示,提出上世纪90年代东南沿海的乡镇企业,“乃是前近代农村家庭手工业的逻辑延伸,它们在存在和发展的动因、基本条件以及亲缘关系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和内在的逻辑联系;由近代而后瞻,近代农村的地方工业毫无疑问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自70、80年代蓬勃发展的农村乡镇工业的先声”。^[28]作者的这种研究取向对探讨中国式的乡村

工业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彭南生近年来发表多篇论文,明确肯定近代乡村手工业在清末民初以来的发展,并将若干地区、若干行业中以技术进步为依靠、以区域外市场为依托的乡村手工业的发展称之为“半工业化”,半工业化存在着向工业化发展的趋势,尽管由于外力的影响,未能最终完成向工业化的转化,但这种以技术改造为主的渐进性工业化模式与引进机器技术为主的突发型工业化模式一道构成中国近代的二元工业化道路。

第五,关于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衰落的认识。如何看待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在外力影响下出现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状况的变化,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对立观点。王方中列举大量史实,说明从 1930 年至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手工棉织业明显衰落了,但是,“手织业的衰落主要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强制造成的。”^[29]夏林根以方志等地方文献为基本史料,对棉纺织手工业的衰落原因进行了补充分析,认为“既是资本主义商品倾销所引起,也是中国社会内部新陈代谢的结果”。尽管棉纺织手工业很早就开始衰落,但“又为什么延续百年而被大量保持下来呢?”夏林根认为棉纺织手工业衰而不落的原因“主要在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和小农经济思想的劣根性”。^[30]但是,近年来也有学者不同意将近代手工业的命运看得过于悲观,史建云认为,20 世纪 30 年代农村手工业的衰落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原因就在于,“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 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31]。林刚以 1927~1937 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为例,对中国传统手工业中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门类进行了定量的实证研究,澄清了学术界一些固有的认识,作者估计直至抗战前的 1930 年代中期,中国棉纺织品中(包括布匹、针织品和其他棉织品),机纱约占 77~79%,土纱约占 21~23%,棉布中的手织布约占 71%,机制布约占 29%。这说明手工业尚未到“垂死的边缘”^[32],这种量化分析更具说服力。其实,用“衰落、衰退、衰亡、垂死边缘”等描述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命运,是否贴切,在语义学上似可进一步斟酌。但如果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角度看,用上述词语对近代乡村手工业命运作定性描述似乎都不恰当。因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远远未到乡村手工业退出其历史舞台的时候,持“衰落论”的学者也不能不承认,它不是内部经济发展的结果,而是外力所造成的。因此,笔者认为更为科学的定性描述是,在外力的影响、主要是 1929~1933 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随后相继发生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等日本侵华战争的打击下,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30 年代初陷入了严重困难时期。在外力解除后,手工业仍可恢复其原有的活力,并会向前继续发展,直至这种增长方式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为止。

三 几点思考

近 50 余年的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研究,无论是论著数量,还是学术质量,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问题也不少,表现在宏观研究不足,分歧较大;区域与行业研究上,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应在现有基础上,针对上述不足与薄弱环节,进一步拓宽视野,更新方法,加强实证分析,推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迈向新的高度。

首先,加强定量研究。数字是经济史科学性的最好体现。然而,从总体上看,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存在着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吴承明、徐新吾等老一辈学者虽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尝试,但离全面弄清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状况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尚有距离。这虽然与近代统计落后、数字缺乏有关,但也与研究队伍自身素质有关。我国现有经济史研究队伍分属于历史学科和经济学科两大类,前者占主导地位,普遍存在着经济学修养不足、数学训练缺失的问题,使得他们大多长于定性分析,疏于定量研究。要克服这种状况,一方面亟需经济史学界深入挖掘、整理史料,另一方面需要从长远着眼,加强经济学、数学修养,借鉴现代计算工具,强化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量化研究。

第二,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所谓整体研究,是指站在宏观角度,将近代乡村手工业史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整合,作为一个经济整体,探讨它的长期存在状况及其原因,分析它在中国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全面评价它在近代农村社会经济中的作用,等等。所谓区域研究,是指站在中观或微观的角度,对一村、一乡、一县或更大的区域如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乡村手工业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尤其应加强对若干近代手工业发展较好的农村地区如河北高阳、宝坻、定县等织布区、山东潍县织布区、江苏通海织布区、山东平湖针织业区、环太湖蚕丝业区、华南缫丝业区等的研究,准确把握不同区域的乡村手工业经济的特点。所谓行业研究,是指对若干重要的乡村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榨油业、造纸业、制糖业、编织业、针织业、陶瓷业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弄清不同手工业行业间的差异及其在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上的地位。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比较落后,区域与行业研究中又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性,在区域研究中,现有成果大多集中在江南、华北乡村手工业经济史领域,其他地区研究较为薄弱,有些地区如西北、东北等区域尚缺乏最基本的研

“衰”与“盛”相对,据《汉语大词典》解释:“衰退”指“(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衰落减退”;“衰落”指“衰败零落,谓事物由盛而衰”;“衰亡”,指“衰落灭亡”。三者用来描述经济状况时,指其由发展状况进入停滞、破产状况,且程度逐步加深,具有不可逆性,“垂死边缘”将这种不可逆性表述得更加清晰。

究。在行业研究中,乡村纺织业、蚕丝业、制茶业的研究较多,其他手工业行业如榨油业、制糖业等行业研究不足。这种研究状况与中国近代乡村手工业的广泛性及复杂性不相适应。因此,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要求我们将整体研究与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结合起来,整体研究只有建立在区域研究、行业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地区、行业间的差异性与不平衡性,区域研究、行业研究只有上升到整体研究,才能克服微观研究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缺憾,否则,研究结论就会走向片面,给人造成错觉和误解。

第三,更为客观与理性。求真求实不仅是史学精神,也应是史家品格,对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客观与理性应是所有研究工作者的共同追求。秉持客观与理性,既要避免以理论、经济模型代替实证研究,又要尽可能防止研究主体受到情感影响,既要超脱于时代,又要避免过多的主观色彩。只有建立在客观与理性的基础上,近代乡村手工业经济史才是真实的历史,只有真实的历史,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既往研究中的某些分歧往往就是由于客观与理性不足所造成的。如对近代手工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解释上的分歧,起源于如何拿捏评价外国资本主义的尺度。拿捏分寸的准确与否,不仅与研究主体的民族情感息息相关,而且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一方面,对百余年来深受外国欺凌的中华民族来讲,憎恶外国资本主义的情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建国后的相当一个时期内,西方国家封锁、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酷现实,更加深了我国学者对历史上的外国资本主义的全面否定,这种现实的情感色彩便被自觉不自觉地倾注到历史研究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西方关系改善,人们开始正视并理性评判外资的作用,学术界又出现了肯定外国资本主义的观点。因此,建国以来史学界在评价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国手工业的关系时,先后出现“破坏论”与“发展论”的观点,此乃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民族情感的反映。但是,历史研究毕竟应该建立在理性与客观基础上,任何过度否定或过度肯定的解释,都可能使其滑向反面。如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揭露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经济的侵略似乎天经地义,无论怎样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也似乎并不过分。但是问题在于,如果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破坏殆尽,被中断了,这岂不是说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这似乎又有“外铄论”之嫌,虽然强调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手工业的破坏之罪,却又不自觉地肯定了它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之功,否定了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自主性。因此,有学者提出外国资本主义虽然破坏了中国手工业,但并不严重,除棉纺业等少数行业外,大多数手工业行业存在下来了,近年来,更有学者在肯定外国资本主义对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模式分解的不自觉的工具时,强调了它在手工

业向机器工业转化中的阻碍作用。摒弃这种偏执一端的观点,惟有秉持史家品格,既不因民族情感而过于强调外国资本主义对近代手工业的负面影响,也不要因当代吸引外资的需要而一味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面作用。

从理论或所谓规范认识出发,也会造成研究中无谓的分歧。如在对“耕织结合”与自然经济解体问题评价上,为什么面对同样的情形,会形成完全相反的观点呢?仔细揣摩既往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术界已经将“耕织结合”的经济性质固定化了,形成了所谓的规范理论:即“耕织结合”模式是自然经济的象征,它的分解标志着自然经济的解体,在这里,“耕织结合”已经概念化为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典型。其实,这种规范认识存在着缺陷:首先,“耕织结合”作为农家的一种经营模式,并不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全部,手工棉纺织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农村手工业行业,棉纺织业衰落了,还会有其他乡村手工业代之而起,在新的基础上形成与农业的新结合。因为,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是近代中国小块土地经营制度所决定的,只要耕地不足,农户就不得不进行多种经营,将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等结合在一起,以维持家庭的延续。其次,“耕织结合”的经营模式也未必一定是自然经济,随着社会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内容、方式的不同,农业与手工业经营方式的变化,名称上虽然还是“耕织结合”,但其经济意义已悄然发生了改变,它可能是商品经济,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关键取决于农家与市场联系的程度及其经营方式的变化。可见,“耕织结合”不仅具有较大的弹性,可以容纳不同类别的手工业,而且具有不同的经济意义。因此,不加区分地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农家织布业看作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然经济”,其实只是看到了乡村手工织布业与农业相结合的表面现象,而没有对该业的具体形态作更精细的分析。在这里,“耕织结合”虽然没有解体,但统统斥之为自然经济,显然是忽视了近代农民家庭手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形式、与市场的联系等方面的变化,及其手工业在农家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对近代农家耕织结合模式尚须作更深入、更细化的剖析。

【收稿日期】 2005-03-18

【作者简介】 彭南生(1963—),湖北黄陂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席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责任编辑 映雪】

参考文献:

- [1]戴逸.中国近代工业和旧式手工业的关系[N].人民日报,1965-08-02.
- [2]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概论[A].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3] 许涤新, 吴承明. 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3.
- [4] 樊百川. 中国手工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的遭遇和命运[J]. 历史研究, 1962, (3).
- [5] 汪敬虞. 中国近代手工业及其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中的地位[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1).
- [6] 吴承明. 近代中国工业化道路[J]. 文史哲, 1996, (6).
- [7] 彭泽益. 近代中国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场手工业[J]. 近代史研究, 1984, (1).
- [8] 黄逸平. 近代中国经济变迁[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9] 史建云. 从市场看农村手工业与近代民族工业之关系[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3, (1).
- [10] 戴鞍钢.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以棉纺织业为中心[J]. 复旦学报, 2001, (5).
- [11] 彭南生. 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99, (2).
- [12] 林刚. 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
- [13] 马俊亚. 混合与发展: 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14] [美] chi-ming Hou.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美]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3.
- [15] 马若孟. 手工棉纺织和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的发展[A]. 张仲礼. 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 [16]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7] 陈诗启. 甲午战前中国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成长[J]. 历史研究, 1959, (2).
- [18] 徐新吾. 对中国近代手工棉织业史料中一些误解的评述[J]. 上海经济研究, 1988, (3).
- [19] 杨宇清. 中国近代手工业的演变和反思[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1, (4).
- [20] 张思. 遭遇与机遇: 19世纪末中国农村手工业的曲折经历——以直鲁农村手工纺织业为例[J]. 史学月刊, 2003, (11).
- [21]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 下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 [22] (美) 赵冈. 现代棉纺织工业的成长及其与手工业的竞争[A]. 载德·帕金斯. 中国现代经济的历史透视[M]. [美] 斯坦福大学, 1975.
- [23] 徐新吾. 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加深分解与解体的过程[J].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8, (1).
- [24] 陈惠雄. 近代中国家庭棉纺织业的多元分解[J]. 历史研究, 1990, (2).
- [25] 谢放. 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J]. 近代史研究, 1990, (1).
- [26] 刘灿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山东手工棉纺织业——兼谈对“自然经济解体论”的认识[J].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经济史, 1988, (6).
- [27] 陈庆德.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社会基础[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 1990, (3). 论中国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趋势[J]. 求索, 1991, (6).
- [28] 张忠民. 近代上海农村地方工业的演变及其趋向[J].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 1994, (2).
- [29] 王方中. 1930~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织业的衰落[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1988, (5).
- [30] 夏林根. 论近代上海地区棉纺织手工业的变化[J]. 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 经济史, 1984, (11).
- [31] 史建云. 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J]. 近代史研究, 1996, (3).
- [32] 林刚. 1927~1937年间中国手工棉纺织业新探[J]. 中国经济史研究, 2002, (2).